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序

黄 裳

十多年来，子善先生辛勤致力于新文学史料的发掘、考证、整理，成绩喜人。他搜集、编定了周作人、梁实秋、台静农、叶灵凤等人的佚文，为读者提供了可读的文本，给研究者摊出了难得的资料，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他开手辑佚的工作时，周作人、梁实秋还是被排除在书林之外的“另册”人物，绝料不到后来居然会“热”起来，在不同意见纷起之时毅然从事，终底于成，不能不佩服他的胆识。周作人后半生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的，但作为新文化史上一个复杂的存在，研究者还是不能略而不论。要论，就要考查实证。在《周作人集外文》两卷中，就辑存了周作人自己删去的大量佚文，大致恢复了《真谈虎集》的本来面目，在读者和研究家看来，无疑是一种快事。对梁实秋作品的考订整理，也是子善先生用力甚勤的一个方面，有《梁实秋著译年表》为证。

中国过去有悠久的辑佚传统，曾蔚为文苑中的别国，如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就是一种名著，为文学史家离不开的文献渊薮。继起者代不乏人。鲁迅先生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也都是人们熟知的。先生的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就是植根于《钩沉》的。基本史料与研究成果之间的紧密联系，灼然可见。鲁迅先生是自己动手收集素材的，因为前人没有留下可以凭依的资料汇编。这就给后人以启示，人们已经重视并着手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成绩是显然的，方向是正确的。这中间就有子善先生的劳绩。

前人进行古文献的辑佚，主要依据的是古典文献类书、总集。偶有细心的学者搜索广及地志、文集——如厉鹗的《宋诗纪事》，就为这一工作扩展了视野，是可以借鉴的方法。新文学辑佚工作所依据的则是报刊、杂志和单行著作，辅之以回忆录、社团史料等，其实还是大有扩展余地的。要达到知人论世的效果，是非把眼界更扩展到社会、政治的大环境不可的。本书中不少记述前辈与辨析史料的文字，就提示了这种研究扩展方向的可能性。作者所援引的书报杂志甚多，这些报刊的背景、倾向与当时作家的思想变化是息息相关的，都是可以进一步探索的课题。比如在30年代，梁实秋所用的笔名就有秋郎、陈淑、敬远、子佳等数十个，这就又有一个考定的问题，作者付出的劳动是可以想见的，往往一篇短文之成，作者不知翻遍了多少书报、杂志，而这些在今天又几乎成了“孤本秘籍”，残缺断烂，检索为难。作者埋头于资料的探寻中，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这是读者捧读这本《生命的记忆》时，难免会产生的沉重之感。

作者又是一位新文学书刊的收藏家。他曾记下历访北京琉璃厂、上海文庙书市的访书经历，读了恍如重睹北京厂甸书市风光。但其辛苦搜访的岌岌心情，却与“冷摊负手对残书”者迥异。偶然拾得一二珍异册籍，就亟亟写短文记之，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欣喜之情。他在北京无意中得到宋春舫褐木庐的藏书，就是这种奇遇。宋先生穷毕生之力搜集的7800册戏剧藏书，50年代已捐赠给北京图书馆，但仍逃不脱狼藉市上的命运，真是言之痛心。不论长篇短制，作者记下的都是值得珍重的史料。子善先生年力正富，未来的收获正无穷尽，这是读者殷切的期待，也是对作者的鞭策。

1997 年 4 月 22 日

生命的记忆

怀人忆事

许寿裳手书鲁迅诗幅

在鲁迅逝世 50 周年纪念前夕，笔者拜访李毓珍先生，高兴地发现了许寿裳先生亲笔所书的一幅鲁迅诗：《七律·为了忘却的纪念》。

许寿裳是鲁迅“几十年的老朋友”，他俩从 1902 年秋在东京弘文学院同修日语时结识起，直到鲁迅逝世，交往之密切，友谊之深厚，决非一般人所能比拟。鲁迅逝世后，许寿裳先后出版了《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书，为介绍鲁迅生平，弘扬鲁迅思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以致最后招来杀身之祸，至今仍使人深感痛惜。据闻湖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鲁迅研究专家林辰先生主编的《许寿裳文集》，以纪念这位中国现代史上知名的教育家、古典文学研究家、鲁迅的挚友。

许寿裳这条诗幅写于 1939 年 8 月，是应李毓珍先生之请而写的（李毓珍笔名余振，现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俄苏文学翻译家）。当时许寿裳在陕西城固西北联合大学任文理学院院长，李毓珍为该校法商学院商学系的俄语助教。由于在校长任命许寿裳接任法商学院院长问题上，激进派教授与保守派教授发生意见冲突，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违反自己制定的“大学组织法”，越权任命另一位法商学院新院长，从而引起西北联大师生的一场风潮，校长愤而辞职。这位新校长到任后，就无理解聘了拥护许寿裳的沈志远、曹靖华等六名教授。李毓珍不过是青年助教，因在这场风潮中站在沈、曹诸位一边，也难逃被解聘的命运。他们离校前向许寿裳话别，并纷纷请他题字留念。许寿裳就欣然命笔，为李毓珍写下了陆放翁的一首七律和鲁迅这首诗。

鲁迅这首著名的七律作于 1931 年 2 月，系为纪念殉难的柔石等五位左联青年作家，鲁迅曾将其“录呈季市兄教正”（许寿裳字季市——笔者注）。许寿裳对这首诗很欣赏，他在《鲁迅的避难生活》中特地提到它，说：“全诗真切哀痛，为人们所传诵，郭沫若先生在抗战那年归国赋投笔诗，不是纯用这首的原韵吗？”在当时形势下，许寿裳把这首诗书赠涉世未深的李毓珍，恐怕也是有寓意在的。

许寿裳并不以书法名，因此他的字留传不多，手书鲁迅诗作也许更为少见。这幅鲁迅诗写得清劲、洒脱，特别是多用古字这一点，分明表现了许寿裳曾从国学大师章枚叔学习《说文解字》的遗痕，别有一格。

（原载 1986 年 9 月香港《明报月刊》249 期）

叶圣陶先生的一幅未刊题签

叶圣陶先生于2月16日溘然长逝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最后一位发起人离开了人世。这位《倪焕之》和《稻草人》的作者，辛勤笔耕70余年，著作等身。他在新文学创作上的杰出贡献，早已有人在研究评说，近年《叶圣陶评传》（陈辽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版）和《叶圣陶年谱》（商金林著，江苏教育出版社版）等书相继问世，用不着我再来赘言。我要说的是我欠了叶先生一段情，叶先生虽然已归道山，我仍深感歉疚。

5年前，我与王自立兄合编《回忆郁达夫》一书。书将编竣，我想到应请一二位与达夫先生有过交往的文艺界前辈题签，叶先生是我考虑的主要人选，因为他不但德高望重，而且二三十年代与郁达夫时相过从，在他主编《小说月报》和《中学生》杂志期间，发表过郁达夫好几篇作品，现存郁达夫1934年9月21日致他的信（见香港三联书店版《郁达夫文集》第九卷）就是两人友谊的见证。但当时叶先生已公开登报声明，由于年迈体弱，不再为人题词写字，怎么办呢？

我不敢贸然行事，只能拜托北京大学研究叶先生的专家商金林兄帮忙。金林兄为人热情，他通过叶先生二公子叶至诚先生为我诚恳相求。叶先生听说要为纪念老友郁达夫的书题签，一口答应，他不顾眼花手颤，花了整整一个上午，认真书写了好几条，又剪贴多次，才挑选了这幅较为满意的托金林兄寄给我。

回忆郁达夫

叶圣陶手迹

叶先生这次破例挥毫，很可能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为人题写书名，五个字苍劲有力，十分难得。我自然是喜出望外，立即把它寄给出版社，要求他们印在拙编封面，把另一幅刘海粟先生的题签印在扉页，出版社当时并未提出异议。万没料到拿到样书一看，封面和扉页所刊均为刘先生的题字。惊讶之余，火速驰函出版社询问，始知因技术原因，没有使用叶先生的题签。这真是令人遗憾之极。叶先生对拙编一直关心，多次问起何时可以出书，待到书终于印出，他老人家的题签却弃之未用，叫我如何向他交代？想来想去，只能再请金林兄辗转说明原委，恳求谅解。尽管叶先生宽厚，没有责备我，但我总感到对不起他老人家。值此沉痛哀悼叶先生之际，把这幅未刊题签公之于世，作为对叶先生的一个纪念。

（原载1988年4月香港《明报月刊》268期）

刘延陵忆郁达夫

1983年初，我与王自立先生合作编集一本《回忆郁达夫》，广约海内外与郁达夫有过交往的各界前辈撰文，意在为郁达夫研究保存若干重要的史料。远在新加坡的五四诗人刘延陵与郁达夫在星洲时期时相过从，自然也在被约之列。刘老不顾年事已高，极表支持，一口允诺。不料没过多久，刘老身体违和，一时难以完稿，万不得已于7月12日致我的信中表示：“前承命写忆郁文，本乐予附骥。奈因俗事太多，屡次执笔愆期，实觉抱歉万分。迁延至六月底，决心拂尽琐务，一意属稿，且已草成数页，继续前进。不料忽患重伤风，寒热交作，卧床十日，今体温虽已如常，而咳嗽余波未尽，并且神疲力倦，无力构思，不知何日才能复原。如再求展期，固然没法启齿，且恐因此拖延尊书出版之日期，更加愧对”，因而提出豁免供稿的要求。我以为以刘老与郁达夫的交谊，拙编缺少他的大作，未免可惜。恰巧当时也在新加坡的郑子瑜先生得知此事，就自告奋勇，于该年12月4日走访刘老，又根据刘老的回忆亲到新加坡虎豹别墅勘查，整理完成了一篇关于郁达夫的谈话纪录。但刘老翻读之后，在感谢郑先生之余，觉得还需再作补充修改，嘱我暂勿收入拙编。为尊重刘老本人的意愿，我只得照办，尽管不无遗憾。

这份纪录稿就这样在我手头一搁就是6年。去年10月18日，刘老在新加坡溘然长逝，噩耗传来，令人深感悲痛。今年11月上旬，郑子瑜先生来上海，我们谈起刘老对中国新诗运动的卓越贡献，也谈到刘老母校复旦大学的出版社有出版刘老诗文集的打算，我就想起了这份纪录稿。刘老晚年很少动笔，这份纪录稿虽然刘老生前未及修改，不能看作最后定稿，但毕竟是根据刘老口述整理而成，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仍然很值得重视。经与郑先生商量，不敢永藏私篋，决定将其公之于世，供海内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参考。刘老如果泉下有知，想必也会首肯的吧？

下面就是这份纪录稿的全文：

达夫先生和我同是五四时期的作者，他是创造社的健将，我只是文学研究会的一个小兵。他擅写小说、游记和旧体诗，风靡文坛数十年，我只写了几首新诗，凑凑热闹。也许是如叶圣陶先生所说的推理法那样吧，那时候的暨南大学负责人，以为我会写作必定会教书和批改习作，于是邀请我在暨大执教，这一教竟教了许多年。不幸我因为用脑过度，脑子出了毛病，不时发痛，医生劝我不可再教书，同时也应该少写作或是停止写作，理由是教书和写作，都要煞费脑力，会加重我的病情。又劝我最好从事于劳力多而劳心少的工作。这虽不至于宣布我的死刑那样可怕，却也是可悲的事。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作者，对劳动该是热爱着的，无如我到底是文弱书生一个，又怎能从事于劳力的工作呢？

然而我终于辞去了大学的教席，想找一份虽劳心又不太劳心的工作来维持生计，我自问对英文的读解能力还过得去，于是立下决心，要在我的有生之年，从事中英文的对译工作。我以为这工作是现成而又有所依据的，不必像写新诗那样须着意构思自立天地，也不必像教书那样须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指批改学生的习作）。可是在那时候的中国，要找个搞翻译的差事也着实不容易，结果我在中日战事爆发之前，便独个儿渡海来到了马来半岛。

当时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华人聚居在这儿可以“夥颐”两个字来形容，要找一份翻译的工作，自然比在国内容易。可是，也可以说是机缘未至吧，我初到北马，却并不当翻译，而去做了几年中小学校长。校长只办行政，比较呆板，可以不必

多费脑力，所以也算是能符合医生的指示，并不违背我的择业的准则。后来我进了星洲日报社编译电讯稿，始与达夫先生共事数年。

新加坡西海岸高地上的虎豹别墅，原是星系报业创办人胡文虎、文豹兄弟的产业，却开放让游客游赏。别墅中有一座名为“挹翠”的拱形石牌坊，两旁共有长短不齐的四支石柱，报社主人要达夫先生撰写两副对联，镌刻于石柱上，达夫先生稍一构思，便写成了。那较短的一副是：

天半朱霞，云中白鹤；
山间明月，海上清风。

那较长的一副是：

爽气自西来，放眼得十三湾烟景；
中原劳北望，从头溯九万里鹏程。

别墅中另有一座不题名的石牌坊，两旁各有一支石柱，达夫为它而题的对联是：

万水汇归，环海银涛收眼底；
金樽共赏，前山翠黛展峨嵋。

达夫先生曾将这十三字句的对联拿来和我推敲，大约也是出自“想当然耳”的推理法吧，他以为我会写诗一定懂得做对子，又一定可以替他的对子提意见和加以润色。自虎豹别墅俯瞰，是九曲十三湾的山坡小道，烟雾迷茫，这当是“放眼”的一句所出。下联可以看出达夫先生对祖国的热爱，以及缅怀过去，瞻望前程的情愫。依我的经验，作者拿他的作品来向你请教，有的意在炫耀自己的文笔，有的希望得到你的赞赏，若你真的提出意见，以为某句某字应该如何修改，那他准会愤然失色，拂袖而去。达夫先生可不是这样，他是真心诚意拿他的对子来和我推敲的，他衷心希望我能提出意见。我以为他这副对联实在写得确到好处，所以只有激赏，未提意见。他似乎感到不满足，这是达夫的虚心和诚实处。

达夫从不恃才傲物。没有和他共事的人，还以为他放浪不羁，凡事随随便便，草草率率。其实，他做事是何等的认真，多么的负责哩！我编电讯，每天下午六时到报社办公，深夜一时停止接收电讯，编辑竣事，已是二时光景了。回到家里（我那时住在俊源街，达夫住在中峇鲁路），往往直到四时才能入睡。达夫编副刊，每天几时到报社，我不大清楚，但我到了报社，他还没有回去。有一个时期，达夫兼任总编辑，须写社论，晚上就和我一样一直工作至深夜二时左右，看了大版，才得归去。他是真的把事情当作事情来办的，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的人，从来不会高自位置，而在这拜金主义挂帅的新加坡，人们看郁达夫不像个郁达夫，只有极少数的文化界人士，才会对他有几分敬意，也特别看得起他。

达夫先生的爱国热情是经得起考验的。他对日本作家佐藤春夫原是十分敬佩，可是后来他得知佐藤春夫为文歌颂日本皇军侵华的所谓“圣战”，他对这位日本著名的小说家立刻由敬佩变成鄙视了，他写了一篇《日本的娼妓与文士》对佐藤春夫作了无情的抨击。有一天，我们报社有一位同事悄悄离职，到南京去参加汪逆精卫的伪政府，当了汉奸。达夫敌我分明，对他很是不齿，从此不再提起他的名字。

达夫常常向我打听祖国抗战的消息，如果是前线胜利，他便欣喜若狂，以为从此可以乘胜追击敌军，收回所有的失地，直捣黄龙，好让大家痛欢庆祝一番。若是前线失利，或是敌军奸淫妇女，屠杀同胞的消息让他知道了，他便悲愤不欢，连续几个钟头。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有一天晚上六时许，他听到了他哥哥郁曼陀被日本特务杀害于沪上的消息，国仇与家恨相交织的愤慨之情溢于言表，他紧握着拳头说：“此仇必报！”充分表现了他的敌忾之气。

一九四二年二月，日军攻陷新加坡，英军不战而降，达夫在这之前的几天坐船到印尼避难。我逃到北马暂避风险，不久又回到新加坡，蛰居后港，日军发布告示限令居民依

时集中检证，在检证中实行大屠杀，杀死十万人众。我没有去集中，也没有被发现（被发现必逃不出鬼门关），后来设法买了一张盖了“已经检证，属于良民”的护身符，才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而且由于多年来都做那不很费脑力的翻译工作，脑病也差不多好了。达夫却在一九四五年日军投降前夕，被日本宪兵杀害于印尼的苏岛，屈指一算，至今已三十八个年头了。

（原载 1990 年 6 月 21 日香港《星岛晚报·大会堂》）

人澹似菊，品逸于梅

——追念郑逸梅先生

郑老一再说过：“在我一生中，最值得我记述的，一是写作，二是教书。”诚哉斯言，郑老足以引为自豪。只是郑老虽执教鞭半个世纪，作育英才，蔚然称盛，相比之下，他的写作成就更为辉煌。早年与范烟桥、顾明道等组织苏州星社，复又加盟南社，与柳亚子、胡朴安、高吹万等名家相投契，被聘为上海鼎足而立的三大报刊《申报》、《新闻报》和《时报》的特约撰述，先后主持《消闲月刊》、《金钢钻报》、《华光半月刊》和《永安月刊》副刊笔政，编写电影剧本《三生石》、《万丈魔》、《国色天香》等，在无声电影界大显身手，后又兼任新华影业公司宣传主任，以及近年为香港《明报月刊》、《大成》、《大公报》、《文汇报》等撰写专栏，都是郑老多姿多采的笔墨生涯中可圈可点的得意之笔。而自1926年推出第一本短篇小品集《梅瓣》，至去年煌煌三大卷《郑逸梅文集》问世，郑老已先后出版著作六十余种，凡一千多万言，这还不包括大量散见于海内外报刊未及收集者。古人有著作等身之说，证之郑老，才真正名副其实，信然无虚。

郑老毕生专注于文史掌故的著述，他对此有强烈的责任感，多次表示：“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将近一个世纪，所闻所见，历历如在眼前，有许多东西，青年人还不知道，我应当把它写出来，这是我的责任所在，否则我这辈老人过去了，这许多史实、掌故，跟着我而过去，岂不可惜！”因而，海内外均誉之为“文史掌故作家”。能受此美称而当之无愧者，大陆难找第二人，在香港也只有已故的包天笑、高伯雨等两三位文坛耆宿而已。不管是为师立传，为友纪事，还是为文史补阙，为冤屈者鸣不平，旁及书画典籍、简札柬帖、玩赏集藏、名胜古迹、园林花木、风俗习尚等等，在郑老笔下无不妙趣横生，文采斐然。特别是清末民初文坛艺苑的风云人物、秘闻轶事，郑老或亲身经历，或与之熟稔，或掌握独家资料，写来历历如数家珍。晚年所著《南社丛谈》、《书报话旧》、《清末民初文坛轶事》、《郑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等书，更是呕心沥血的集大成之作，为近、现代社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颇受海内外学人所重视。

早在30年代初，郑老就因喜为报刊撰写补白性的随笔小品，一时“郑补白”、“无白不郑补”之名不胫而走。后来臻于炉火纯青之境，名号也随之升级，海内外均以“补白大王”、“补白大师”尊之。80年代以降，郑老接连出版《艺林散叶》和《艺林散叶续编》两书，总计补白性随笔6600余条之多，令人叹为观止。郑老的补白多则数百言，少则十余字，文字精炼，耐人玩索，吉光片羽，足资启迪。他写人物，只描画其一眉一目，一笑一颦；记事件，只择其涉笔成趣的精采部分加以渲染；抒情怀，也是含蓄浓缩，以格言点缀其间。如最短的一条：“许地山擅弹琵琶”，寥寥七字，就把许地山鲜为人知的特长和盘托出。这种“补白”被论者称之为“郑公体”，既继承了六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和清代张潮《幽梦影》的传统，又有郑老自己的创造和风格，推陈出新。这是郑老在写作上的又一大贡献，连新文学作家楼适夷先生也予以充分肯定：“郑逸梅专写补白的短文，人称他是补白大王。今虽年老，现仍健在，我们老读者是很怀念他的。”

■

郑逸梅著《花果小品》扉页和他的签名

按照大陆以往对现代作家的分类法，郑老应归入“旧派”文人之列。五四新文学勃兴以后，新旧两派针锋相对，壁垒分明，新文学家对“旧派”文人的抨击可谓不遗余力。郑老当时虽未首当其冲，但到了十年浩劫就难逃厄运，被斥为“鸳鸯蝴蝶派”文人，打入另册，吃足苦头。其实，当年对“旧派”文人及其作品的批判颇多偏激过火处。“旧派”也好，“鸳鸯蝴蝶派”也好，毕竟也是现代文坛的一个流派，至今拥有大量读者，在保存某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探索文学的多种表现形式等方面，自有其一定的历史功绩，岂能全盘否定？何况“旧派”文人和作品也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也在吸取新文学的长处，两者并非水火不相容。即以郑老而言，他在长期的写作中就大大提升了文史掌故的文学和学术地位，逐渐赢得了文坛的承认和尊重。至于郑老思想开明，淡于名利，以“不与富交，我不贫；不与贵交，我不贱”为座右铭，更体现了一个正直的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色，绝非当今那些僵化保守、趋炎附势的新文学家所能比拟。“人澹似菊，品逸于梅”，这就是郑老为人为文的真实写照。

笔者与郑老仅一面之缘。80年代初，与上海《文汇报》金晓东兄同访郑老，当时谈些什么，早已不复记忆，但郑老亲切谦和，谈锋甚健，却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去年以来，先是因与复旦大学陈思和兄合编《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传记》丛书，请郑老为《张恨水传》作序，接着又代表《明报月刊》约请郑老撰写专栏，均蒙惠允，倾力支持，笔者衷心感铭。郑老谢世，使本世纪有影响力的“旧派”文人全部隐入历史，今后不大可能再产生像郑老这样的文史掌故大家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为此略志数语，藉表缅怀纪念之忱。

（原载 1992 年 9 月香港《明报月刊》321 期）

一个后辈的怀念

记得那是 1977 年初夏，我在北京政协礼堂休息室首次见到胡愈老，我是因注释《鲁迅全集》书信的需要，特地去向他老人家请教的。他的大名我当然早已知道，因此有点忐忑不安。可是见面之后，我就发现自己的顾虑是多余的，胡愈老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忠厚长者，没有一点架子。他耐心地倾听我就鲁迅与生活书店的关系所提的几个问题，由于耳朵重听，还不时要求我重复一遍，然后一一作了仔细的解答，大概看到我笔记不快（那时还没有录音机），他故意说得很慢，说几句就停顿一下。为了使我能掌握更多的有关史料，他还建议我去拜访生活书店的另一位老前辈徐伯昕先生。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就这样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结束了，临别时，他老人家又叮嘱我，注释《鲁迅全集》意义重大，如有问题，可再去找他。这次谈话给我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 10 年后的今天追忆，胡愈老的音容笑貌仍然宛在眼前。

3 年以后，我与王自立先生合作编注《郁达夫忆鲁迅》一书，自然地想到应请胡愈老题签。正好我那时有北京之行，就再次去拜访他老人家，不巧那天胡愈老外出，我只能在门口值班室留下一张字条失望而归。没想到两天之后，我就收到了他老人家的复信和他亲笔书写的“郁达夫忆鲁迅”横、竖条各一幅，信中谦虚地说，你们编这本书，很有必要，但我毛笔字写不好，很少为别人题字，勉强写了两条，能不能用，由你决定。这信，这字幅，怎不使我欣喜万分？后来选用了胡愈老竖写的那幅题签，书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后，引起海内外人士的注意，算是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一片盛意。

最近几年，考虑到胡愈老年事已高，又忙于国事，我尽可能不再去打扰他老人家，不过有时在研究中碰到无法解决的疑难，仍忍不住去信，他总是有求必应，及时作复。现检出两封，照录如下：

陈子善同志：

二月三日来信收到。

秋白同志牺牲后，鲁迅先生很可能邀集一些党内和党外同志开会商谈过出《海上述林》等事。但是我是否参加那一次的会，全不记得了。捐款可能是有的，但我也记不得了。如果是在郑振铎家开会，是有可能的。我生平唯一一次和秋白同志见面，也是在郑振铎家，当时是商量文学研究会事，但那是 1923 年前后的事了。我只记得《海上述林》出版后，鲁迅先生曾送我一册，这本书（上下册）现在我还保存着，在抗战时，我所有的书籍文件都丢失了，唯有《海上述林》是由我的现已过世的兄弟仲持代我收起来，所以至今保存着。

特复，祝

春节愉快！

胡愈之 二月七日

子善同志：

兹九转来信收到。

承询洪、黄、胡、韩情况，我都不清楚。只有韩槐准我是相识的。他是研究一种药用植物，即红牡丹起家的。在新加坡搜集中国古瓷器，献我国博物馆。约在六十年代回北京定居，任故宫博物院顾问，不久即去世。其余的我就不知道了。

勿复，祝

健康！

第一封信写于1980年，当时我正在查考鲁迅与瞿秋白的交往，向胡愈老请教鲁迅编印秋白遗著《海上述林》的经过；第二封信则写于1982年，当时我正在研究郁达夫旅居星洲的活动，向胡愈老了解其星洲友人黄孟圭、胡浪漫、韩槐准诸位的情况。这两封信不仅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今天重读，更使我深深感到胡愈老的诚恳和热情。

为了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我和自立先生又合作编订一本《回忆郁达夫》。征稿期间，我无意中在达夫先生的侄女、画家郁风先生处发现胡愈老于1947年郁达夫被害两周年时在他自己主编的新加坡《南侨日报》上发表的《关于纪念郁达夫》一文，不禁大为惊喜。文章虽仅短短千余字，却颇为重要，文中强调：“达夫可算得近代中国少有的一个天才诗人，他的作品应当在中国文艺史上，永远保留一个地位。”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国内一直无人知晓。为慎重计，我立即复印一份寄请胡愈老过目审定。他老人家十分高兴，亲笔在影印件上加了两个说明寄还我，同意收入重新发表。对文中提到的当时星洲的“文化比椰粕和香蕉皮更不值钱”这句话，胡愈老唯恐现在的读者看不懂，还特地加了一句注释：“日占领新加坡时缺粮食，一般食用椰子的糟粕和香蕉皮，在市上出售。”他的认真和细心，由此可见一斑。这一切，无疑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宝贵支持。而今，几经周折，拙编终于问世，胡愈老却不及亲见了。

众所周知，郁达夫在南洋失踪之后，海内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说惨遭日寇暗害的，有说为印尼游击队所杀的，更有别有用心者，说他死于共产党友人之手，还有说他已遁入空门的，等等。胡愈老的长文《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首次揭开了郁达夫失踪之谜，在郁达夫研究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但是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这篇文章也存在不足之处。文中说郁达夫1945年8月29日晚失踪，9月17日被害。根据当时日寇已宣布投降的形势，似乎不大可能把郁达夫关押半个多月再下毒手，因此，我对郁达夫死于1945年9月17日说产生了怀疑。1983年下半年，日本研究郁达夫的著名学者铃木正夫先生到复旦大学访问，我有机会与铃木就这个问题多次交换意见。铃木透露他已找到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日本宪兵队头目，并掌握了关键性的证据，只是这个头目不敢公开承认。这个消息非同小可，我马上写信向胡愈老和郁达夫的另一位好友楼适夷先生汇报。

翌年夏天，楼先生到上海，打电话约我见面，说是胡愈老要他传话给我。我赶到楼先生住处，看了胡愈老的信，始知他老人家非常关心此事，他把我的信转给楼先生，并要楼先生转告我，他坚信郁达夫为日本宪兵所害，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进一步探讨郁达夫被害的详细经过，他要我与已经回国的铃木保持联系，敦促铃木利用他的有利条件，把郁达夫被害真相搞个水落石出。显而易见，胡愈老并不因为日本学者和我对他文中所说有不同看法而感到不快，而是尊重事实，欢迎争鸣，以实际行动提倡学术自由，这种宽容、豁达的态度尤其使我感动。

于是，我遵照胡愈老的嘱托，在与铃木通信时多次提到此事，希望他能进一步调查。铃木经过再三努力，终于说服那个宪兵队头目正式承认是他下令在1945年8月29日晚或30日凌晨秘密绑架杀害了郁达夫。铃木的调查报告在1985年9月富阳郁达夫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后引起海内外轰动，会后我把

协助铃木整理的调查报告中文稿寄给胡愈老，让他老人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在 1985 年 8 月 29 日召开的北京郁达夫纪念会上，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胡愈老。他在会上以清楚响亮的声音对郁达夫其人其文作了崇高的评价，首次提出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流的作家。会议进行中，胡愈老还不时与坐在一起的李一氓、夏衍等几位前辈谈笑风生。由于人多，我在会上没有趋前向他老人家问候。万万没想到不到五个月，胡愈老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原载 1989 年 2 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初版
《胡愈之印象记》）

悼念许钦文先生

许钦文先生以 87 岁的高龄溘然长逝了。凡是稍微了解一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不会不知道许钦文的名字。许老与鲁迅先生是同乡，在文学创作上也长期得到鲁迅先生的指点和帮助，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故乡》就是由鲁迅先生花费了大量心血，亲自编选、校对并出资付印才得以问世的。他的反映石作工人悲惨命运的短篇小说《石岩》也曾得到鲁迅先生的推崇。鲁迅先生还在 1924 年 2 月“拟许钦文”的小说《理想的伴侣》的笔法，写了一篇《幸福的家庭》，更使许钦文声名大震。作为“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许老在 20 年代文坛上占着较为重要的地位，这已为文学史家所公认了。

笔者曾有幸聆听许老的教诲。那是 1977 年的春天，笔者参加《鲁迅全集》书信卷的注释工作，到杭州拜访一些与鲁迅先生有过交往的文坛前辈，受到许老的热情接待。他那时已经是 80 岁的耄耋老翁了，而且视力大为减退，却仍然精神矍铄，谈锋甚健。在西湖边上他那幢别致的小屋里，许老与我们交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他深切怀念鲁迅先生和他的挚友、著名美术家陶元庆，对“四人帮”打着鲁迅旗号糟蹋鲁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则颇多勸勉之词。他还兴致勃勃地向我们出示了香港鲁迅研究专家张向天先生的几部新著，使我们大开眼界。我们告辞时，许老一直送到小园门口，还一再叮嘱，有什么问题可再去找他，欢迎我们再去。

但是，考虑到许老毕竟年事已高，鲁迅书信中关于他的一些疑难问题又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所以我们后来就没有再去打扰他。只是在三年后的浙江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上，笔者与许老又见过一面。那天他老人家不辞年迈体弱，亲自到会祝贺，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使全体与会者大受感动。

尤使笔者终生难忘的是，许老在去年应自立兄和笔者之请，为我俩合编的《回忆郁达夫》一书撰文的事。郁达夫先生惨遭日寇毒手已快 40 年了，国内至今没有出版过一本回忆、纪念达夫先生的专集，而在国外，早在 50 年代，新加坡就已经印行过《郁达夫纪念集》，日本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富有意义的工作。有鉴于此，我俩不自量力，决心合编一本《回忆郁达夫》来填补这个空白。许老在了解了我们的编选意图以后，虽然已在病中，还是高兴地答应我们的请求，很快就写好《悼念郁达夫氏》一文寄来了，并在信中谦虚地说，不知文章是否合用，如有不妥之处，尽管删改就是。

许老在二三十年代与达夫先生时相过从，还发表过一篇《郁达夫丰子恺合论》，针对当时有不少人“一提到郁达夫就要摇头大骂”，提出了“要是郁达夫先生，真在一天到晚的喝酒打牌跟女人，那末，那里还有功夫读书做小说呢？”这样颇有见地的看法。不过，许老这篇大作没有全面回忆与达夫先生交往的始末，而是截取了一个非常时期，即上海“八一三”战事前后，两人患难与共的情景。郁达夫当时如何热心介绍他去福建师范任教，两人如何结伴同赴福州被阻，到福州后郁达夫又如何关心和帮助他，都追述得真切动人。朴实的文字中，流露出作者对达夫先生的衷心感激，对达夫先生热爱祖国，憎恨侵略者的高尚品德，作者更表示了他的钦敬。文章最后，作者深情地说：“时光已经流逝了半个世纪，郁达夫先生的遗体还埋在南洋。不过，可以告慰达夫的是，他的诗集和文集已经先后出版，他和他大哥的双烈亭也已在他们的故乡富阳鹳山落成。郁达夫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总将永远为人们所赞颂。”这真是道出了我们大家的心里话。近几年来，我们已经很少

读到许老的文章了，这篇文情并茂的回忆录，很可能就是他的绝笔。遗憾的是，他老人家未及看到拙编《回忆郁达夫》的出版，就已离开了我们。

许老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对新文学发展作出很大贡献的老作家，一位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令人十分悲痛。为了检阅许老半个多世纪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浙江文艺出版社已经出版了收集较为完备的《许钦文小说选集》，《许钦文散文选集》不久也将问世，许老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吧？至于笔者，将永远铭记许老的宝贵支持。

（原载 1984 年 11 月 30 日香港《文汇报·笔汇》）